

敦煌讲座书系

敦煌的归义军时代



冯培红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敦煌讲座书系

冯培红 著

敦煌的归义军时代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敦煌的归义军时代 / 冯培红著. -- 兰州 :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0. 12
(敦煌讲座书系)
ISBN 978-7-5423-2389-7

I. ①敦… II. ①冯… III. ①敦煌学-政治制度-研究 IV. ①D691.2②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1007号

出 版 人: 吉西平
策 划: 王光辉 薛英昭
项目负责: 秦才郎加 王露莹
责任编辑: 薛英昭 杨 昀
封面设计: 徐晋林
版式设计: 赵 鹏

敦煌的归义军时代

冯培红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55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32.75 插页 4 字数 438 千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978-7-5423-2389-7 定价: 64.00 元

总序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曾经是游牧民族驰骋的舞台，也是中原王朝的边镇和经营西域的基地，更是东西文化交往的丝路重镇，蕴涵着多元文化。公元4世纪开始开凿的敦煌莫高窟，迄今仍保留着大量的洞窟、塑像、壁画，而在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写本和绘画等，数以万计，内容丰富多彩。

敦煌石窟的美术作品和藏经洞的各种语言文字的文献，构成了百年来敦煌学研究的基本资料，加上周边石窟、简牍、墓葬出土文物，敦煌学研究的内涵并非仅仅限于敦煌。敦煌学研究的范围，涉及宗教、思想、历史、考古、语言、文学、美术、科技等等许多学科，利用敦煌保存的材料，学者们对于这些学科的研究构成了现代学术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敦煌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界有的学者把敦煌学看作是一部伤心史，陈寅恪先生虽然不太赞同这种说法，但也指出当时中国研究敦煌学者不过三数人而已，且“罕具通识”。历史的车轮转到21世纪初，中国敦煌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成果涉及多个领域，可谓蔚为大观。

然而，敦煌学越是深入发展，也有着题目越来越小、视野越来越窄的倾向。敦煌学的成果越来越多，有自己的刊物和专题会议，与

学界其他领域的沟通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外界面对如此庞大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即使想略知一二，也不知从何下手。这样的倾向其实严重影响着敦煌学的发展和进步。

在21世纪，敦煌学的发展不仅仅要追求新材料，还要向其他学科学习，进一步更新方法，思考新问题。

我们发起编纂《敦煌讲座》书系，就是希望利用集体的力量，来撰写一套敦煌学各个分支领域的通论性著作，体现百年来国内外敦煌学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代表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这套书的作者队伍以中青年敦煌学研究者为主，希望新人写新书，把相关领域的敦煌学研究水平系统地呈现出来。每本著作既是作者对某一领域研究的代表作，又是能够让敦煌学领域外的人阅读、参考的读物，可以引导读者进入敦煌学的相关领域。

日本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曾出版过9本一套的《讲座敦煌》丛书，主要以不同类别的文献为基础，对敦煌学的材料做了通论性的阐述。现在30年过去了，各国收藏的敦煌文献资料基本上刊布于世，敦煌石窟的图像资料也比较容易见到了。因此，我们编纂的《敦煌讲座》书系，力图区别于传统的敦煌文献研究，希望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文献到历史，从文献到艺术，从文献到各个领域，把敦煌文献与历史、艺术等学科中的某个专题结合，把敦煌学的基础知识用新的方法、新的脉络串联起来，用新的视角来阐述敦煌学的各个方面。

敦煌学博大精深，在某些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敦煌讲座》书系可以说是我们努力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我们期待今后敦煌学的新人谱写更加美好的篇章。

《敦煌讲座》书系编委会

(荣新江执笔)

2013年9月30日



序说

藏经洞与归义军

归义军是晚唐设在以敦煌为中心的西北边陲藩镇，中经五代诸朝，至北宋前期覆亡，先后由敦煌大族张、曹等氏世袭掌政，统治长达一百八十年左右。10世纪初，唐帝国灭亡后，五代十国群雄纷纷割据，独立建国，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也摇身一变，建立了西汉金山国及敦煌国；曹氏时期，虽然奉五代、北宋为正朔，重建归义军藩镇，但《新五代史》、《宋史》却将之列入《四夷附录》、《外国传》，而辽朝亦承认其为敦煌国，列入《辽史·属国表》。荣新江在《归义军史研究》的《前言》中说：“归义军在唐朝是一个边远的藩镇，五代、宋初则成为实际的外邦，这是归义军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性之一。”^①可谓是为恰当的总结之论。

关于归义军的历史，传世史籍记载极为欠缺，仅有只言片语，自然难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所幸在20世纪初，封闭了近九百年的敦煌莫高窟第17窟在不经意间被道士王圆箎打开了，那里面封存着大量归义军时代的文献档案与绘画作品。这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小型洞窟，开凿于巨型洞窟第16窟甬道的北壁上，位于莫高窟南区北段底层，原为张氏

^①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页。

（注：本书仅在第一次注释时才详标作者、书名及出版信息，以后引用相同文献时均略写出版信息，常见古籍多次引用者则省书作者）

归义军初期河西都僧统吴洪辩的影窟。到了曹氏末期，由于某种至今仍然不明的原因，该窟中堆放了大量分帙包装的写本及其他文物，之后窟门便被封扁起来，并在外面涂绘壁画，从此许久不为人知。这个尘封千年的洞窟，直到1900年才被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偶然地打开，它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藏经洞”。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是幸运的，出土的约六万件敦煌文献及绘画品为复原归义军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素材，但不幸的是，藏经洞破壁之时，正值八国联军大举侵犯中国。具体地说，1900年6月21日，西方列强入侵京畿，清朝被迫“宣战”。次日，远在西陲敦煌的王圆箎道士开启了藏经洞。历史竟是如此的巧合，悲惨的国运也给敦煌文物带来了厄运。不久清军战败，被迫订立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列强得以全面侵略中国，于是形形色色的国外探险队纷至沓来，涌入中国的西北地区，开始大规模掠夺文物。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奥莱尔·斯坦因（A. Stein）先行一步来到敦煌。翌年，法国人保罗·伯希和（P. Pelliot）紧随其后，以及后来的日本人橘瑞超与吉川小一郎、俄国人鄂登堡（S. F. Oldenburg）、美国人兰登·华尔纳（L. Warner）等，都从敦煌石窟及其藏经洞中攫取了大量珍贵文物，运至域外，致使敦煌文物散失海外，分藏于世界各地。从斯坦因、伯希和早年拍摄的照片看，分帙包装的卷轴式及其他装帧形式的纸本文献及绢画等物，原本非常整齐地堆放在藏经洞中。

目前公开发表的藏经洞文献，一般认为最晚的是现藏于俄国圣彼得堡、编号为Φ.32的《宋咸平五年（1002）七月十五日敦煌王曹宗寿与济北郡夫人汜氏捐经题记》。^①在此稍前，曹宗寿发动政变，杀害从叔曹延禄，夺得了归义军节度使的宝座。然而，此时的归义军已经快要走到

^① 也有学者提到1002年以后的敦煌文献，但荣新江经过仔细考辨，发现它们不属于藏经洞出土物，而是在莫高窟北区石窟等地出土的。参见其《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8—39页。



图1 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



图2 伯希和在藏经洞中挑拣敦煌文献

末路。因此，藏经洞的封闭当在1002年后不久，其所封存的文献及绘画品主要属于9、10世纪的归义军时代。这些敦煌文献包括官府公文、民间契约、儒家经典、佛经抄本、文学作品、医学药方等，内容十分丰富，使用汉、藏、回鹘、于阗、粟特等多种胡汉文字书写。在有些公文及佛经上，还钤盖了归义军时代的各种官私及寺院印章，具有原始档案的性质，学术价值极高。^①

另外，敦煌石窟历经千余年的不断修凿，在归义军时期臻于鼎盛，出现了第156窟（张议潮窟）、第98窟（曹议金窟）等巨型洞窟，里面绘列了归义军时期的各级官员、眷属、僧侣、民众等供养人画像。这一时期石窟供养人画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画像几乎与真人等高。比起过去身躯渺小、不甚起眼的画像，归义军供养人像更加写实，很可能就是当时的真人画像。在这些画像的旁边，均题书有一长串颇为冗赘的官衔，或是表示其身份的文字，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在当时敦煌地方上

^① 关于敦煌文献简明扼要的介绍，可参见池田温《敦煌文书の世界》，东京：名著刊行会，2003年，第23—59页。本书所引用的日文论著，仅在脚注、书末之《参考文献》及图版中，对题目保持日文原文，其他悉译作汉文，特此说明。

的社会地位。

正是有了这批珍贵的藏经洞文献与绘画品，以及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及题记，归义军的丰富历史内容才逐渐为世人所知，大大填补了传世史籍记载的空白。尤其是敦煌文献大多为当时当地的官私档案，没有经过后世史家的润笔修饰，具有第一手的性质，也就显得更加珍贵。尽管它们只是残纸断片，所记录的是历史碎片，但通过串联这些文献残卷，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历史学者将它们置放在唐宋之际的史实背景中进行严密考证与系统论述，已经大致揭示出了归义军历史的骨架与面貌。可以说，没有敦煌文献及相关资料，归义军的历史也就永远地被湮没在漫漫黄沙中了。

自从藏经洞发现以来，中外学者开始了对敦煌文献与石窟艺术的求索研究。如前所说，这些资料大多属于归义军时代，因此，对归义军历史的探讨也就成了敦煌学研究中的重点与热点，百余年来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然而，20世纪是个多灾多难、极不平静的时代，世界各国所藏敦煌文献的刊布与研究也受到了时代的影响，伴随着这一坎坷的刊布历程，学术研究得以层层进步，归义军历史的神秘面纱才逐渐被揭开。

1909年，罗振玉编纂的“《敦煌石室遗书》中由曹元忠撰写的《沙州石室文字记》，是第一篇利用敦煌文献结合史书有关记载研究归义军史的论文。……这篇文章为确立曹氏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世次奠定了基础，有关西夏未能有效控制沙、瓜的观点也极富启发性”。^①这是曹元忠依靠伯希和在北京所展示的敦煌文献进行研究的最初成果。继此之后，罗振玉、王重民、孙楷第、向达等利用当时所能见到的较为有限的敦煌文献或其照片，撰写了《瓜沙曹氏年表》、《补唐书张义潮传》、《金山国坠

^① 郝春文《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113—114页。曹元忠文收入罗振玉编纂《敦煌石室遗书》，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诵芬室排印本；此据黄永武主编《敦煌丛刊初集》第6册《敦煌石室遗书百廿种》，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第341—353页。

事零拾》、《敦煌写本张议潮变文跋》、《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罗叔言〈补唐书张义潮传〉补正》等论文，^①筚路蓝缕，对归义军历史作了开创性的探索，为旧史所载归义军史实纠正讹误、填补空白。

1934年，翟林奈(L. Giles)在考释S.788v《沙州志》时，文后附收了两篇论文，其中第二篇以《公元8—11世纪敦煌地区的历史》为题，主要利用英藏敦煌文献，并结合传世史籍，对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及归义军的历史进行系统性研究，勾勒出了节度使张、曹二氏的世系。除了S.788v，他总共运用了29件英藏敦煌文献，其中属于归义军时代的达20件。^②尽管有些断代不甚准确，历任节度使中缺了张淮鼎，但他首次披露了如此众多且有价值的伦敦藏卷，为研究归义军节度使世系及其历史奠定了基本框架。

1941—1943年，藤枝晃主要依靠那波利贞从巴黎抄回的法藏敦煌文献，以及狩野直喜抄自伦敦之部分，以连载的形式发表长篇论文《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除了进一步详考归义军历史及节度使世系外，还重点论述了它与中央王朝、周边政权的关系，将之放在更为广阔的中西交通史背景下探讨，视野开阔，内容详赡。^③较之翟文，藤枝氏运用敦煌文献的数量更多，尤其是价值更高的巴黎藏卷，论述也更为周全严密，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因此长期以来被奉为归义军史研究领域中的权威力作。

① 这些论文可参见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室、兰州大学图书馆合编《敦煌学论文选》上册，兰州，1983年，第42—239页。

② Lionel Giles, "A Topographical Fragment from Tunhuang", Appendix B: History of the Tunhuang Region from the Eighth to the Eleventh Century A. D., *Bulletin of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7, no.3, 1934, pp.556-572.

③ 藤枝晃《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始末（一）～（四）》《東方學報》（京都）第12册第3分，1941年，第58—98页；第4分，1942年，第42—75页；第13册第1分，1942年，第63—95页；第2分，1943年，第46—98页。

366 LIONEL GILES—
APPENDIX B
HISTORY OF THE TUNHUANG REGION FROM THE EIGHTH TO THE
ELEVENTH CENTURY A.D.

An Lu-shan's rebellion, which broke out in 755, delocalized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by opening a door to Tibetan aggression, finally led to their severance from the Empire. The general trend of events may be gathered from the following extract: "In the flourishing period of the Tang, Ho-hai and Lang-ye comprised 33 chow, of which Liang-chou was the largest. The soil was fertile and produce abundant, and the inhabitants well-off and happy. The country was suitable for horse-breeding, and the Tang established eight centres for the tending of 300,000 horses. The An-hsi Protectorat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control of thirty-six kingdom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ang troops acted as protection for over 300 cities, which were constantly garrisoned by Chinese soldiers, the centre of administration being at Liang-chou.

"During An Lu-shan's rebellion, when the Emperor Su Tang took up his residence at Ling-wa,¹ he recalled all the troops in Ho-hai to deal with the emergency. Taking advantage of this, the Tibetans attacked and subdued the million Chinese inhabitants of Ho-hai and Lang-ye, who thus came under the barbarian yoke. In the reign of Wu Tang (827-846),² envoys were sent to the Western Regions in order to visit Kan, Liang, Kua, and Sha-chou. The towns were still there, and the people, who had been enslaved by the barbarians, on seeing the Chinese envoys, beat the streets and welcomed them with acclamation. Sheddling tears they said: "Does our Emperor still bethink him of us poor souls who are now under Tibetan rule! These people were the descendants of those who were subjugated by the barbarians in the Fung-pao period (743-755). Their speech had been slightly modified, but the fashion of their clothes had undergone no change.

"By the time of the Five Dynasties, the Tibetans had become weaker, and various barbarian tribes, including the Uighurs and the Tang-hiang, invade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without, however, interfering with the population. At that time China was in a state of decadence and disorder, and was unable to extend a helping hand. Only the four chow of Kan, Liang, Kua, and Sha remained in regular

¹ Near Ping-hai, Kansu, in A.D. 756.
² Ch'u-wu-hsi shih narrows the receipt to 838-840.

图3 Lionel Giles, "History of the Tunhuang Region from the Eighth to the Eleventh Century A.D".

以上对归义军历史开展的研究工作，只是基于个别学者对敦煌文献的阅读或抄录，尤其是英、日学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研究成果，在很长时间内不为中国学者所知，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外学者对归义军历史的探究有所停滞，从而阻碍了这一课题研究的进展。20世纪50年代，伦敦、北京所藏的敦煌文献被拍摄成缩微胶卷公刊于世。这虽然为归义军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新材料，如唐长孺利用英藏敦煌文献发表了《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等有分量的论文，^①但总体而言，因受政治形势的影响，1949年后30年间大陆学者关于归义军史研究的成果不多。在台湾地区，苏莹辉发表了数十篇论文，

① 载《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5—298页。

東方學報 五八 (三七〇)

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始末 (一)

藤枝 晃

序 說

上 國 唐軍の河西地方の形勢
一 張氏の世系
二 歸義軍節度使(以上藤枝著)
三 唐兵退去の後の唐兵の勢力
四 節度使と唐の關係

下 國 河西交通路上の概況
一 張氏時代の節度使
二 五代初期の河西交通路
三 歸義軍の來、在の關係
四 歸義軍と河西交通路上の諸國との關係
五 西夏の興起と河西交通路の關係
節度使の性格

歸義軍節度使とは唐の大中年(五二一—五二九)より北宋の眞祐年間(一〇一〇—一〇二四年)のころまで約二百年間敦煌州に據つてゐた地方政權——乃至は小王国である。唐朝の西方發展は古來曾有のものであつたが安史の亂のちその國力が衰へ初めると隴右河西安西の諸方すなはち今日の甘肅新疆兩省の地には南方より吐蕃が進出して來て之を領有するに

图4 藤枝晃《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始末》

出版了多本论文集。^①尽管他的考论推测成分较多，有的被后来的研究者证明是错误的，但他凭着自己的勤奋执著与对敦煌学的热爱，在远离敦煌的台湾孤军奋战，成为这一时期研究归义军史最活跃、成果最多的学者。

1979年，巴黎所藏的敦煌文献也被制成了缩微胶卷。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黄永武主编的《敦煌宝藏》将中、英、法三国所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悉数影印，陆续出版了煌煌140巨册。^②这一刊布形式，大大方便了敦煌学者的阅读和使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包括归义军史在内的敦煌学研究的飞跃进步。日本学界策划出版了大型系列丛书《讲座敦煌》，其中第2卷《敦煌的历史》之归义军部分由土肥义和执笔，另外森安孝夫所撰回鹘与敦煌部分亦与归义军密切相关。^③与此同时，中国大陆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学者们利用《敦煌宝藏》或缩微胶卷勤奋研究，涌现出了一大批归义军史论著。尤其是荣新江积十余年之功，较为全面地调查了世界各国所藏归义军时代的敦煌文献，包括当时尚未公刊的英藏S.6981以后部分、中国各地散藏，以及俄国、日本藏敦煌文献等，总共利用数量近600件之多。他在陆续发表系列论文的基础上，于1996年集结出版了《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这是归义军史研究领域中的首部专著，细致考订了历任节度使的卒立世系与称号，探索钩沉隐晦不显的归义军史事，以及归义军与甘州

① 苏莹辉研究归义军史的论文，收入了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四本论文集中，即《敦煌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修订3版；《敦煌论集续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瓜沙史事丛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敦煌文史艺术论丛》，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以及《敦煌学概要》，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8年。有关苏氏最详尽的论著目录，参见何广棖《苏莹辉教授及其敦煌学论著目录编年》，中央文史研究馆、敦煌研究院、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编《庆贺饶宗颐先生九十华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994—1015页。

② 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1—14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1986年。

③ 榎一雄主编《讲座敦煌》第2卷《敦煌の歴史》V《帰義軍（唐後期・五代・宋初）時代》（土肥义和撰）、VI《ウイグルと敦煌》（森安孝夫撰），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第233—33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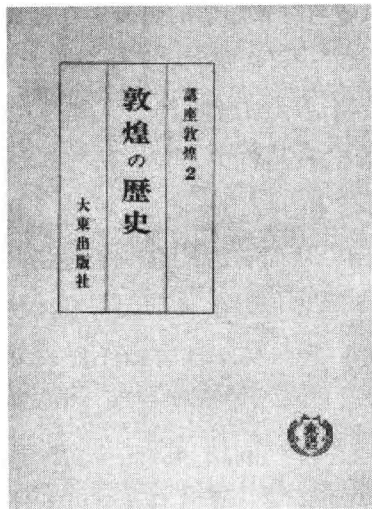


图5 榎一雄主编《講座敦煌》
第2卷《敦煌の歴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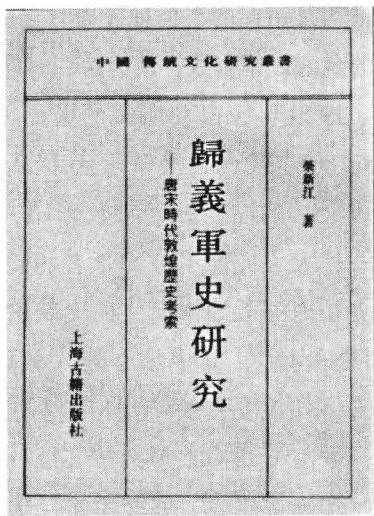


图6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

回鹘、西州回鹘等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堪称集大成之作。杨继东进一步对张议潮时代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考察。^①

最近 20 年，敦煌学赶上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那就是全世界所藏的敦煌文献基本上都被公布出版了，包括原来一直秘藏难见的俄国、日本藏卷，均以高清晰度图版的方式大规模影印出版。^②尤有进者，英、

^① Yang Jidong, "Zhang Yichao and Dunhuang in the 9th Century",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vol.32, no.2, 1998, pp.97-144.

^② 《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 1—15 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2009 年；《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 1—10 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1—3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5 年；《俄藏敦煌文献》第 1—17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 年；《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 1—146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2012 年；《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書集成》卷上、中、下，东京：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特定领域研究〈東アジア出版文化の研究〉总括班，2005 年；《敦煌秘笈（影片册）》第 1—9 册，大阪：财团法人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2009—2013 年。本书引用的敦煌汉文文献甚多，为避免繁琐，凡不出注者皆参考以上图版。

法两国图书馆还将其馆藏的敦煌文献扫描上网，提供阅读与免费下载，使全世界的学者可以方便地看到彩色图版。到此为止，百余年来敦煌文献的刊布工作大体得以完成，对藏经洞的性质也有了全面把握与认识的可能，这大大推动了归义军史研究的新进展。李正宇、郑炳林、杨秀清、雷绍锋、刘进宝、赵贞、吴丽娱、杨宝玉、李军等学者在该学术领域发表了大量论著，^①不仅将归义军史研究推向纵深，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近来的研究模式主要是基于对敦煌文献的文本细读，从而屡创新高，取得了新的进步。例如，吴丽娱、杨宝玉从考释敦煌书状入手，结合晚唐、五代史实背景，撰写了一系列极有价值的论文，并“决定以《归义军朝贡史研究》为题，写一部有关归义军政治关系史的研究著作。在这部书中，我们将对一些新、旧史料进行从个案到整体的分析探讨，关注与归义军相关的诸种政治势力及其各时期的关系变化，提供对归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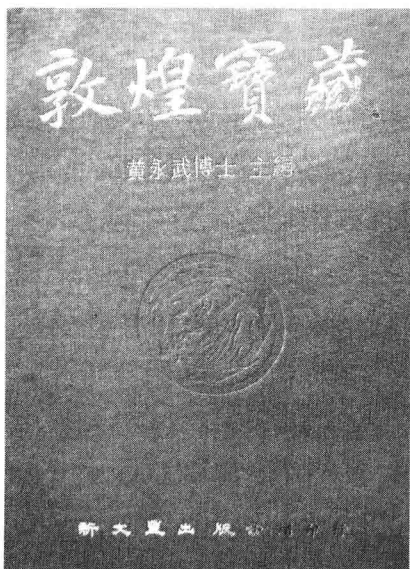


图7 《敦煌宝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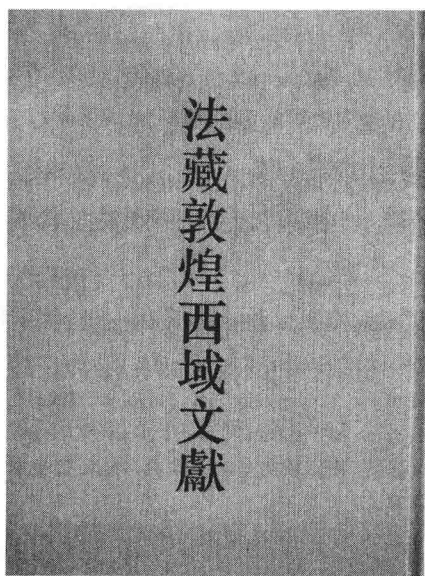


图8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① 参见本书后附《参考文献》。

军史的新发现和新认识”。^①此外,森安孝夫系统搜集了铃盖在敦煌文献上的官印印蜕,研考归义军节度、观察使的双印并授现象,对于认识归义军在不同阶段的政权性格及其与中央王朝的关系颇有启发。^②武内绍人整理与考察了归义军时代的藏文书信,^③坂尻彰宏、赤木崇敏利用敦煌汉、藏文文献开展对归义军历史的细部研究,均发表了系列论文,^④足堪关注。

综上所述,史载省略的归义军历史之所以能不断地被拨开神秘的面纱,逐渐为人们所了解,端赖敦煌文献的出土。这正如藤枝晃所说:“归义军节度使的历史在学界引起重视,是在敦煌石窟的遗书发现以后的事情。”^⑤一个世纪以来,分藏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的影印刊布,经

① 吴丽娱《敦煌资料的再发掘与归义军史的新探索》,郑炳林主编《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2008年度理事会议暨“敦煌汉藏佛教艺术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350页。

② 森安孝夫《河西歸義軍節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編年》,《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V,2000年,第1—122页,pls.I—XV。

③ Tsuguhito Takeuchi, "A Group of Old Tibetan Letters Written under Kuei-i-chün: A Preliminary Study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Old Tibetan Letter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 tomus XLIV (1-2), 1990, pp.175-190; 武内绍人《歸義軍期から西夏時代のチベット語文書とチベット語使用》,《东方学》第104辑,2002年,第106—124页。

④ 如:坂尻彰宏《歸義軍時代のチベット文牧畜関係文書》,《史学雑誌》第111编第11号,2002年,第57—84页; Sakajiri Akihiro, "A Tibetan Register of Grain Delivery in Dunhuang in the Period Following Tibetan Domination: Pelliot Tibétain 1097", *New Studies of the Old Tibetan Documents: Philology, History and Religion* (ed. by Imaeda Yoshiro, Matthew T. Kepstein and Tsuguhito Takeuchi), Tokyo: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011, pp.257-270. 赤木崇敏《河西歸義軍節度使張淮鼎——敦煌文献 P.2555 pièce 1の検討を通じて——》,《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X,2005年,第1—25页; Akagi Takatoshi, "The Genealogy of the Military Commanders of the *Guiyijun* from Cao Family", *Dunhuang Studie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for the Coming Second Century of Research* (ed. by Irina Popova and Liu Yi), St. Petersburg: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12, pp.8-13.

⑤ 藤枝晃《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始末(一)》,《東方學報》(京都)第12册第3分,1941年,第66页。

历了不同寻常的坎坷过程，因此，对归义军历史的认识，是伴随着敦煌文献的不断刊布而陆续推进的。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献构筑起了归义军历史的基本骨架，填补传世史籍中存在的空白，订正相关讹误，从而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归义军的真实面貌。可以说，归义军晚期封闭的藏经洞在千年之后被打开，为揭开归义军之谜提供了基本史料，没有藏经洞就难以再现归义军的历史。